

## 一 政治风云

### 1. 北京的三次沦陷

北京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外国的入侵，曾遭受了 3 次沦陷之苦。这便是 1860 年英法联军的焚烧，1900 年八国联军的屠戮，以及 1937 年日本侵略者的占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很大的权益。但是列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为了压迫清政府进一步屈服，英法两国接着制造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 年 5 月 20 日，英法两国军队在炮舰的掩护下占领了大沽炮台。26 日，侵略军进攻天津，并扬言要攻占北京。这时，慌了手脚的咸丰皇帝赶忙派官员前往天津与入侵者议和。6 月，清政府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条件，分别与

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两国政府仍未满足，蓄意再次挑起战火。1860年4月，英法联军攻占舟山，继而北上，夺取了大连湾和烟台。8月初，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14日、21日相继攻占塘沽、大沽。9月21日，清军在通州八里桥大败，京城门户大开。次日，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命其弟恭亲王奕訢留京“督办和局”。

10月5日，侵略军占领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金银财宝，文物珍品，凡“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同时侵略军还在海淀、六里屯、亮马桥、小关等地烧杀抢掠，纵火焚烧德胜门角楼，炮轰西直门。京郊民众忍无可忍，圆明园附近谢庄百姓，在猎户冯三保带领下奋勇抗击侵略者。然而，清廷官员却一味奴颜求和。

10月13日，清廷留城官员义道等人竟然开门揖盗，将安定门打开，让侵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城。进城的侵略军在安定门架起了大炮，四处进行巡逻。15日，各城门的清兵帐篷军器，“及城门守兵，并枪刀弓箭等物”，居然全部撤走，使北京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池。

在京城完全为侵略者所控制的情况下，奕？全盘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件，不仅与侵略者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而且又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的第一次陷落就这样与英法侵略军的枪炮和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屈辱地结合在一起。

1900年，也就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后的第40个年头，中国仍然处于民族危机的灾难之中。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清廷对内高压对外屈从，终于发生了义和团革命运动。以山东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像一股巨大的洪流，迅速蔓延于华北和东北的大地。是年入夏以后，义和团发展到了京城。由于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得到了清廷的支持，京城内外拳民日众，处处设坛习武，仅城内就有坛800余座。义和团在北京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他们决心对义和团进行疯狂镇压。

6月初，英、法、美、俄、日、德、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开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7日，侵略军占领大沽炮台。这时，天津城内外的义和团民与爱国的清军奋起和侵略军进行了近一个月之久的战斗。7月14日，天津沦于敌手。天津陷落20天后，一支2万

人的侵略军由天津沿运河开始向北京推进。清军和义和团民曾于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地设防抵抗，但由于清军腐败，虽然人数不下 10 万之众，但多是“闻敌辄溃，实未一战”。这样就使得侵略军进军的速度加快了。

8 月 13 日深夜，侵略军兵临北京城下。守卫京师的禁军不战自溃，号称善战的甘军也逃跑了。14 日，“夷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打进城来，慈禧闻讯便携带光绪，“青衣徒步，至西华门外乘驴车”逃出京城。北京再次沦陷了。

北京陷落后，八国联军分国划界，屯兵驻扎，随之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杀戮、抢掠、焚烧和奸淫。被八国联军屠杀的不仅是义和团团民，而且有众多的平民百姓。侵略军不仅随意开枪杀人，甚而将人绞死或活埋。北京街头无论大街小巷，还是民舍官邸，处处可见到横七竖八倒着的尸体。抢掠是明令准许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曾招认说：“联军占领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 3 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参加抢劫的不仅是军队，教堂的神职人员，驻华的公使，甚至连他们的夫人均参与其间。抢掠财物的价值，“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至于放火焚烧，奸淫妇

女，更是罄竹难书。

经过这场空前的洗劫，一座居民逾 300 万的北京城，竟然变成了“坊市萧条，狐狸昼出”的荒凉之地。

历史过去了 30 多年，中国依然没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还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一直图谋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出动了军队从东、北及东南三个方面包围了北京（当时称北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却电告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无论战和，万勿单独进行”。宋哲元便命令部队“既要极力奋战，又要尽力避战”，实际采取了“尽力避战”的退让态度。然而此时的日军却在北平的周围越聚越多。

随着日军咄咄进逼，北平民众及广大二十九军官兵抗日热情的高涨，宋哲元的态度也开始有所变化。7月 25 日、26 日，当日本侵略军于廊坊和广安门进行军事进攻和挑衅时，宋哲元便果断地命令二十九军进行坚决的抵抗。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同仇敌忾，给予日军有力的打击。然而这时日军已全部完成了对北平进攻的战略部署。宋哲元坚决抵抗的决心来得太迟了。

7 月 27 日，日军在向北平发动总攻之前，

对通县、团河及小汤山等地的二十九军发动了攻击，迫使这些驻地的二十九军退到了南苑，接着向二十九军军部南苑扑来。当天，宋哲元命令二十九军军部移到北平城内，并命令赵登禹师长为南苑地区指挥官，与留在南苑的副军长佟麟阁协同作战。

28日清晨，日本机械化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向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一带的二十九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在南苑的战斗中，日军从东、南两侧进攻，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路后，又从北面扑了过来。尽管二十九军官兵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南苑部队的通讯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统一指挥失灵，伤亡极其惨重，不得不撤回北平。部队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掩护，以及敌人的堵截，两位高级指挥官佟麟阁与赵登禹先后壮烈牺牲。是日下午，北平的南大门南苑陷入敌手。

当南苑战况急趋恶化时，宋哲元将北平的军政权力交予了张自忠，自己移往保定去了。8月4日，日军开进了北平。14日，具有民族正气感的张自忠秘密逃出了日军魔掌。19日，汉奸江朝宗出任伪北平市市长。

就这样，古老的北平再一次地沦陷了，日

本占领北平长达 8 年之久。8 年中，居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民族的压迫和凌辱。但是古城的人民没有屈服，他们采用各种形式，一直坚持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顽强斗争。

## 2.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那么，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都城，在辛亥革命暴风雨的前前后后，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清廷迫于形势开始推行“新政”，裁冗员、设学堂、编新军、兴实业等举措先后出台。然而“新政”只不过是清廷的“敷衍之策”。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如果国家“政体不更，宪法不立，武备、实业终莫能兴”，因此，向清廷提出了“立宪”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更认为“新政”乃是清廷骗人的伎俩。于是当 1905 年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新政时，有革命党人吴稚晖挺身而出，他

慨然表示：“樾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当清廷统治下的“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故宁牺牲一己之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10月24日，吴樾于前门火车站，携炸弹登上了五大臣离京的专车。随着一声巨响，炸弹爆炸，吴樾当场牺牲。5大臣虽未丧命，却使清廷受到极大的震动。

1906年，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但它既不宣布立宪年限，更不肯放权。于是立宪派便提出“请开国会”的要求，继而掀起国会请愿活动。当时京城立宪派慷慨激昂，又是召开大会，又是征集签名，并提出了“以三年为国会之期，以国会为立宪之本”的要求。

1908年冬，光绪和慈禧先后病死，年幼的溥仪继承皇位，由他的父亲载沣摄政，汉族官吏遭到排挤，政权完全落入皇族手中。因此国会请愿活动再掀高潮。1910年，立宪派在北京连续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大请愿。清廷虽被迫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却又下令解散各请愿代表团，把外地代表统统驱赶出京师。同时于次年5月，公然建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将“预备立宪”这块欺人的面纱完全撕去。立宪派请开国会实行

“立宪”的要求实际完全落空。

正当立宪派的国会请愿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之时，革命党人又在京城组织了一起暗杀活动。这次暗杀活动的策划者为汪精卫。汪当时力主“排满”和暗杀，并在革命党人中组织暗杀团。孙中山虽不赞成搞暗杀，对汪进行多次劝告，却终未能阻止。暗杀团到北京后，以琉璃厂一家照相馆为据点，四处活动，最后选中摄政王载沣为暗杀对象。

1910年4月1日夜，暗杀团成员喻培伦、黄复生潜伏于摄政王府东一座小桥下，安置炸弹，准备载沣经过此处时将他炸死。不料事泄，清兵将汪精卫、黄复生等人捕获，并将汪、黄二人判为终身监禁。尽管载沣保住了性命，但却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一年后，震撼中华大地的起义枪声终于在武昌响起了。

当武昌起义的快报传到北京后，清廷被震呆了。载沣手忙脚乱，六神无主。在紧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他双眉紧锁，面如土灰，许久未发一言，整个会议像死一样的沉寂。直到庆亲王奕劻恳请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兵前往镇压，他才如梦初醒，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随后，武昌起义消息传遍京城，达官显贵均感突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人心惶惑，谣

言四起。一时挤兑风起，金价上扬。不少殷实人家携款存入外国银行，并将眷属安置于租界之内。南籍京官及其家眷离京者亦为不少，致使前门车站拥挤不堪，行李如山。入夜之后，由于停电，街巷之中几无人迹。“大清国的气数已尽”，成了京城百姓私下的口头语。

清廷在无可奈何之际，不得不再度起用袁世凯，妄图用他的北洋军扑灭革命烈火。这时南方许多省份已纷纷响应武昌起义，相继宣告独立。然而在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及直隶一带，反动势力却仍在竭力挣扎。当时直隶总督陈夔龙就公然叫喊：“北京现有皇上，当此人心不靖之秋，惟以保卫地方为宗旨，勿论新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面对如此形势，潜伏在北京及其附近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准备采用革命的暴力手段，配合南方革命党人，一举摧毁清王朝。

1911年11月初，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阴险狡诈集军政大权一身的袁世凯，虽然表面上表示效忠朝廷，暗中却与革命党人联络，企图利用新旧势力之争，自己夺得天下。11月27日，北京的革命党人陈雄、李汉杰、高新华秘密商定，在城里举行起义。当

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假意表示支持，并拿出了 5000 余元，作为配合起义的“发动费”，还约定 29 日晚 10 时鸣炮为号，由其长子袁克定率北洋军予以响应。陈雄等革命党人信以为真，加紧进行准备，三人还都自告奋勇参加了敢死队。时至 29 日夜，革命党人按计划举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的奸诈和欺骗，当夜由袁克定带来的军队不是支援，而是捉拿革命党人。结果三位领导人先后被捕，不幸牺牲。但北京起义的失败并没有削弱革命党人的斗争意志，当 1912 年 1 月初，近畿滦州爆发起义后，北京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在积极准备行动了。

京东通州不仅是古运河的起点，还有座环境幽静的协和书院（今潞河中学的前身）。1911 年春，有位 17 岁的青年蔡德辰来到了这所教会学校学习，他以书院为掩护，在学生中秘密组织了共和会通州支部，并经常到北京城内革命党办的《国风报》馆进行联络。同时还利用书院常与当地驻军来往的有利条件，积极联络军队中的下级官兵。12 月，通州共和会会员全体加入了同盟会。

1912 年 1 月初，当滦州革命军宣告独立，揭起武装反清旗帜时，蔡德辰便决定于 12 日

在通州举义，配合滦州革命军直捣清廷。可惜不久滦州起义便失败了，通州起义被迫推迟。就在此时，出狱不久的汪精卫（当时任京津同盟会会长）派人前来阻止通州起义，声称现正值南北议和谈判，起义不得举行。蔡德辰等人对汪与袁世凯的关系已有所察觉，没有理会汪的劝阻。然而 1 月 16 日，在汪精卫的出卖下，蔡德辰、王治增等 7 人遭到了清军逮捕，随后被残忍杀害。通州起义因此而失败了。

正当清军扑灭通州举义的时刻，北京城里又响起了炸弹声。袁世凯出卖革命党人，镇压 1911 年 11 月底的北京起义，不仅激怒了通州蔡德辰等人，同时也激怒了北京的张先培等革命志士。1912 年 1 月中，北京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 10 余人，在南城荆州会馆集会，决定 16 日当袁世凯入宫上朝时击毙他。事先，张先培等人了解到袁出入宫均走东华门，而东华门至丁字街又是袁世凯的必经之路，于是张、黄便隐蔽在路旁的店铺中，由杨禹昌左右巡视。

时近正午，袁世凯果然乘着装饰华丽的马车从东华门出来了，卫队前簇后拥，很是神气。当马车行至张先培隐蔽的店前，张立即向袁投扔了一颗炸弹。轰的一声。马车被炸翻

了，袁被扣在了车下。这时黄、杨亦将炸弹投向了袁世凯，惜均未能炸中。袁的护卫遂将张、黄、杨逮捕。次日晨，三位志士惨遭杀害。

继张先培等烈士而起的是革命党人彭家珍。彭早就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己任。当他得知宗社党（皇族成员之组织）的头目良弼极力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及清帝退位时，便决心除掉良弼。1912年1月25日深夜彭家珍写下了“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的绝命书。次日，他径直来到了良弼的住所——西四北红罗厂，待良回家时，便向他投掷了炸弹。良弼的腿被炸断，两日后丧命。彭家珍志士当场也牺牲了。

革命党人的频繁起义和暗杀活动，使清廷权贵人人自危，袁世凯亦托词而不入朝，并扬言“革命党已及肘腋，祸变将防不胜防”。清廷见大势已去，终于在半月后，颁布了退位诏书。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 3. 五四运动在京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

利而告结束。次年 1 月，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召开了分赃会议，即所谓的“巴黎和平会议”。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可是在列强操纵下，会议不仅不理睬中国要求取消袁世凯与日本订立的“二十一条”提案，反而公然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5 月 1 日，这一消息传到北京，京城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极为震惊。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忘记，去年 11 月，为庆祝大战的结束，学校还特意放假 3 天，学生和教师都曾在公众面前发表过演说，认为战争的胜利乃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而今铁一般的现实告诉他们的是，强权依然如故，公理亦无胜利。他们震惊了，他们愤怒了。当日，部分爱国师生便在西斋饭厅举行会议，决定 5 月 3 日在三院礼堂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并邀请全市各校派代表参加。

5 月 3 日，北京各界民众也都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集会，商讨如何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就在这时，北京政府中一位有良知的官员，将政府准备签字接受和约的消息，告知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校长马上于东堂子胡同家中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将这一消息传告

了学生代表。是晚北京大学全校学生正在三院礼堂举行大会，会上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扼要地介绍了巴黎和会讨论中国问题的经过和当前形势。学生们纷纷登台演讲，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声泪俱下。当得知北京政府决定要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一位学生当即撕下衣襟，咬破了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接着会议决定次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全市各校学生的游行示威。

5月4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会聚法政专门学校，商议游行示威的具体事项。其内容包括发表演说，置备旗帜，向各国使馆表示意见，去曹汝霖家（亲日派，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示威等项。会议散后，代表们立即赶回学校，准备带领学生于天安门集中。

午后1点多钟，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天安门，他们手执写着“收回山东权利”、“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亲日派，当时为驻日公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等口号的旗子。这时天安门前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竖立起的一面长方形白旗，上面写着痛斥卖国贼曹汝霖和章宗祥

的文字。在这面旗子的旁边还挂着 3 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写的血书“还我青岛”。

当各校学生到齐后，一位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迅速登上华表前的一张方桌，高声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学生散发传单。这时，北京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先后都到了这里，对学生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他们一面怒吼“学生队伍必须解散”，一面又说：“天气很热，请诸君及早回去休息”。愤怒的学生那里会听他们的这些陈词烂调，回答他们的乃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了。

当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时，守卫在那里的军警公然出来进行阻拦。游行学生便推举代表先到美国使馆，随后又到英、法等国使馆，但美、英、法使馆都拒绝接受意见书。当学生代表来到日本使馆门前时，日本卫兵蛮横地阻止学生入内。学生代表将这一切情况立即告知广大的游行群众，学生们听后更加义愤填膺，遂决定去卖国贼曹汝霖家，找他算账。

这天的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宴会过后，两人相约一同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家中。大约 4 点多钟，大批游行的学生涌到了赵家楼曹宅的门前。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军警林立，便高喊：“卖国贼

曹汝霖快出来！”这时一些学生上前去推大门，被军警阻拦；另一些学生则爬进了院内，并从里面将大门打开。学生们便一拥而入。

冲入曹宅的学生，在院中搜寻曹汝霖时，发现正厅中居然挂着一张日本天皇的照片，更加怒不可遏，立即上前将它打得粉碎，同时还不少家具和陈设抛在院中砸毁。这时，正躲在贮藏室里的曹汝霖吓得浑身发抖，尽管他能听见外面的动静，却一动也不敢动。

“起火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滚滚浓烟从曹宅冒起。这时躲在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听到起火的喊声，慌忙逃了出来。但他万没想到，当他刚一钻出锅炉房就碰见了学生。学生们见他西装革履，以为他就是曹汝霖，于是不由分说将他痛打了一顿。与此同时，大队警察得知曹宅火起，迅速赶来，他们封锁了胡同，并将还未离去的学生逮捕。

学生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个学校。北京学生决定从 5 日起开始罢课，并发表了致各界书，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时各校校长也举行会议，商议如何保释学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积极奔走，有人劝他说，这样做恐怕要危及自己，他却笑着说：“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